

鄉土文學論戰給香港帶來了甚麼影響？

筆者在去年十月間曾為青年文學獎作了一次公開演講，因為題目涉及的原故，席間不止三數人同時提問起一樣的問題。無疑問香港地域上端伏中國南尖、政治氣候與中國大陸形影相關；但在文學思潮方面，卻遠受台灣牽動，自文星叢刊發行本港，帶起了普遍的中文閱讀風氣以降，香港一直便是台灣出版物的最大市場。所以李敖、崔小冰、陳映真、柏楊、雷震、殷海光、于長城等學人作家的冤案聲援最切的就在香港。而本港的現代文學寫作潮流，亦隨台灣的興衰有所起落，雖然本港在三四年前由青年文學獎及中國學生周報溫健驅為首展開了文學方向的討論：『批判的寫實主義』或『文學從生活出發』，大力扭轉了青年作者的寫作態度，使作品矢的落實，但由於當時以也斯為最出名的一班青年作者團聚於『四季文學』旗下，仍是去向無從，質弱了新生一代的文學力量。再加社會上沉滯如舊，徵文比賽無疑是比前增多，文學獎由第三屆引出的信念可就一屆比一屆消沉和低姿勢，他們無能作紮實的信念繼承，只有年復一年在疑惑文學與社會的關係與責任，這點實在令人惋惜。

同時期間，台灣那邊，由於美國國會台灣人權聽証會的壓力，陸續釋放了李敖、柏楊、雷震、陳映真等人，也把變相幽禁的陳鼓應，王曉祥等人稍鬆忌禁。出獄後的陳映真聯同了他一直奮戰不懈的至交：尉天聰，再發見王拓，喚起黃春明，認追台灣文藝的傳承班子，乘着唐文標早前對現代詩的批判餘風，雄姿英發，他們便再次光大了作家一時代和社會的良心——的美譽。得道多助，就連一些原來伐撻時弊的在野政人也參予行列，其中如何文振和侯立朝，原本就是當年文星倒台後對之大力張討的人物，何文振更是當時侯立朝所主編刊物『現代』的重要小說作者，風格極力崇尚意識流，但現在回頭覺悟現代文學寫法的死結，反助新一代社會批判作家一把，確是難得。至於何欣、張系國、劉大任、曾心儀、于于、陳雨航、楊青矗、季季、林海音、聶華苓等島內外和老中青的一批作家，亦是有助所謂『鄉土文學』，實則該正名為社會批判的文學的旁勢。

台灣的社會批判文學的興起，並不能純以『鄉土文學』看待，原因是與原有的台灣文藝（早期的台灣文化協會）等的努力角度有所異同，前者面對的正是蛻變中的半殖民地化而又全速向小民族資本／大國際壟斷資本經營方式竄進的工商業開發社會，人民正開始感受資本主義的毒氣和凌勢，後者則一直至今纏害於日治時期的脈涼與先住民期的奮鬥過程，兩者之間容有血脈通接之處，但今日台灣廣大人民的當下問題卻非前歷史期

的傷痕為主體，今日面對的是帝國主義用經濟手段再次來臨的陰影／農村在工業化方面的類化的挫傷／城市工人被加工政策下犧牲權益的戕害／知識分子的希望與明天／新生代對國家民族的自主權的熱衷／新興中產知識實業層的政治改革要求／國民黨面臨威權崩潰的前夕，再加上北京中共拋出統一中國軟硬兼施、國際外交孤立的手法。面對以上種種不可卸避的局面，覺醒的作家群當然亦惶急有所望獻出微力。他們一部份是沖淡矛盾，走改良的道路，如楊青矗，由抒寫勞工危困以至走上競選國家民意代表之途，希望勞資共濟，起碼給勞方以人的地位。亦有革新的力量，如王拓，以鄉村福利為主，投入部份國民黨外的非黨人士的陣營，刻意爭得政壇上一份發言權。今日台灣文壇上的兩位赴義式人物，勇氣非凡，文學畢竟推動良心成為『吾往矣』的入世力量。

另外有一位極受注目的作家，陳映真，似乎只有以知識人的偏執終節。他出獄後共發表了三篇作品，兩篇環繞着外資在台灣的狂恣與及外省本省人的諒解為主題，進行了極富藝術手法的描繪，餘者便是催生更新一代青年作家的工作：寫題跋、評論推介。有一位留法巴黎第七大學東方研究院的研究員朋友，赴合作了一番橫剖式探訪，當會見陳映真時，他說陳的殉道精神仍濃，與王拓一類則還有不同，陳有熱熾的理念，對各方事情愈見關心，所謂『鄉土文學』之爭，大抵不會導至他畏懼窒步，雖即現時任職於美資機構為公關工作，養妻活兒，抽不出足夠時間在文壇上再抹厲；但陳表示，如有可能，會辭去冗職以求更多時間寫作，給新生了的台灣文壇把持向上邁進。

陳映真的轉折生命，的確值得本港年青一代從事文學工作者的深思，有位現在蝸居馬料水謀稻梁於中大的過氣詩人余光中先生，為了盡國民黨員的職責，在發表『狼來了』之前，不惜『勇敢地』密告台灣警備司令部，告陳是×諜，給陳先打一棒，全台圈內人皆知，甚至旅港的施叔青也不齒其人其事，青年文學獎的創作研習班找她與余光中一齊負責小說組導師職務時，她氣得不願與余共唔。清白立場。

回頭談談，余光中現時高據青年文學獎的首席判人，甚且擁有余黨（黃國彬、黃維樑、蔡炎培、胡菊人等）之勢，台灣的『鄉土文學』欲想影響本港，談何容易。本港青年文壇仍走不出倚仗盛名作家的困限，說『鄉土文學』可以影響青年文壇，還是無以為答，朋友呵。

